

论明清词话编撰的动机及其类型、特点

刘岳磊*

〔摘要〕 当前学界在明清词学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以明清为断代的词话史研究尚未出现,对明清词话编撰的全面研究亦存在不足。从编撰动机来看,有资闲谈、备遗忘、立宗开派、助填词、互为标榜、追名逐利、为学问、宣扬文学观念、彰显郡邑文化等九种。由于明清词话的产生源于不同的编撰动机,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编撰类型,归结起来又大致可分为原创撰述型、汇编抄录型、增删修订型三类。

〔关键词〕 明清词话;编撰动机;编撰类型;编撰特点

词话是词学理论最典型、最集中的论载方式。近人谢之勃《论词话》云:“词话者,纪词林之故实,辨词体之流变,道词家之短长也。”^①随着词学研究的深入,词话的研究也日益兴旺。如唐圭璋《词话丛编》为词话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基础。其后王熙元《历代词话叙录》、谭新红《清词话考述》等在词话文献考述上均有了新的突破;朱崇才《词话史》、《词话理论研究》一方面为词话进行了史的建构和梳理,另一方面亦为词话进行了理论架构,使得词话研究有所深化。这些研究成果促使了词话研究的精深化,然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明清词话编撰的研究还未曾全面展开,还有待更进一步的深化。虽然近年来,学界已有诸如刘雨《〈人间词话〉写作年代考》、^②姜荣刚《从内证看〈人间词话〉手稿的写作时间》^③等对《人间词话》编撰时间进行了新的考订、补证;陈昌强《〈赌棋山庄词话〉及续编之成书与文献价值》^④对谢氏词话编撰过程的考察,唐圭璋《〈词苑丛谈〉跋》^⑤、王熙元《历代词话叙录》^⑥以及孙克强、张东艳《〈词统源流〉等四部词话伪书考》^⑦等著述对《词统源流》《词藻》《词坛纪事》《词家辨证》四书的编撰作者、源流等问题的考察,钟振振先生《〈古今词话〉批评》^⑧对沈雄《古今词话》的编撰来源的批评、考辨等,对明清时期词话编撰的研究均有一定的涉及,但多集中于个案。明清词话编撰的整体研究尚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因此本文拟在对明清词话编撰的相关问题进行整体考述的基础上,专门来探讨明清词话编撰的动机及其类型特点。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210097。本文为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ZZ_0205)阶段性成果。

① 谢之勃:《论词话》,《国专季刊》1933年第1期。

② 刘雨:《〈人间词话〉写作年代考》,《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③ 姜荣刚:《从内证看〈人间词话〉手稿的写作时间》,《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2期。

④ 陈昌强:《〈赌棋山庄词话〉及续编之成书与文献价值》,《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2期。

⑤ 唐圭璋:《〈词苑丛谈〉跋》,《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44页。

⑥ 王熙元:《历代词话叙录》,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第104页。

⑦ 孙克强、张东艳:《〈词统源流〉等四部词话伪书考》,《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

⑧ 钟振振:《〈古今词话〉批评》,《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一、明清词话的编撰动机

明清时期词话的编撰者身份各不相同,编撰动机也大相径庭,因此他们所编撰的词话功能也各有侧重。还原明清词话编撰者身份有利于“知人论世”;在此基础上探究他们的编撰动机和目的,也有利于更全面地把握明清词话在当时编撰的真实情况,进而揭示明清词话编撰的类型及其编撰特点。据笔者考察发现,明清词话的编撰动机主要有资闲谈、备遗忘、立宗开派、助填词、互为标榜、追名逐利、为学问、宣扬文学观念、彰显郡邑文化等九种情况。具体剖析如下。

其一是“资闲谈”。即明清词话多以继承宋元纪事词话的传统,“以资闲谈”。如张宗橐《词林纪事》,据陆以谦《词林纪事》序“纪事者何?有事则录之,否则,词虽工弗录。”及张嘉谷《词林纪事》跋:“日书成,聊资谈柄而已。”^①可知其《词林纪事》的编撰旨在汇集佳话,以资谈柄。又如叶申芑《本事词》自序曾言:“孟棻汇本事之篇,叙破镜轮袍以纪丽。诗既应尔,词亦宜然,此《本事词》所由辑也。”知叶氏编撰目的当为效仿孟棻《本事诗》,以为词坛留存佳话。其他如徐鉉《南洲草堂词话》等亦属此类。值得注意的是,与宋元人纯粹以纪事为编撰目的有所不同的是,明清词话作者在纪事的同时,更加侧重于对所纪“资闲谈”的内容进行学术性考察。即对所纪之事进行一定的考证或判断。如叶氏《本事词》卷下首则“左誉《眼儿媚》条目”即有“花庵以此词为阮阅休作者,误矣”之考证等。又如张宗橐《词林纪事》卷五考苏轼《念奴娇》一词云“此阙各本异同甚多,此从《容斋随笔》录出。容斋,南渡人,去东坡不远。又本山谷手书,必非伪托。又《词综》谓他本‘浪声沉’作‘浪淘尽’,与调未协。考谱‘浪淘尽’三字平仄未尝不协,觉‘浪声沉’更沉着耳。又谓‘小乔初嫁’宜句绝,‘了’字属下句乃合”等。

其二是“备遗忘”。即编撰目的旨在为后世保存词学文献及词坛故事等。随着词学的逐渐发展,纪事词话编撰者已经不满足于此类词话的助闲谈的功用,他们编撰的目的更多的是为后世保存词学资料,为后学研究提供文献上的便利,具有备忘功能。如王士禛《花草蒙拾》卷前有王氏自缀数语云:“往读《花间》、《草堂》,偶有所触,辄以丹铅书之,成数十条。”可知是书的编撰旨在记录自己对《花间》及《草堂》的评论之语,以备遗忘之用。与之相同还有陆鏊《问花楼词话》,其自序有“顷者长夏无事,偶阅《花间》、《草堂》诸刻,追忆旧闻,久遂成帙,聊以备遗忘”之语,由此可知陆氏词话的编撰目的亦是“聊以备遗忘”。其他如郭麐《灵芬馆词话》多记载了当时词坛逸事以及郭氏与其友朋往来题咏唱和之作等,除具备以资闲谈的功用外,亦为后世保存了当时词人词作等相关资料。另有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许彦宗称其“谭者之园囿也”,虽其编撰有“资闲谈”的意味,然更多的则是以存留词学文献为目的,故屠倬称其“至于博征明辨,搜罗散佚,信足为词苑有功之书”。

其三是“立宗开派”。明清词话中有许多词话以宣扬某种词学主旨或以“承师学、立词派”为目的。此类词话或借前人的词学著述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或著书立说以示师承及其词学宗派观念。一方面,以宣扬词学标准为编撰目的的,其在编撰、辑录词话资料时多按照自己的标准采录词学材料,凡不合自己主旨者不纂、不录。姚燮辑录的《玉遂楼词学标准》即是如此。是书内容多为前人有关词律的论述,所谓“标准”即点明了其主旨在于为学词者提供可资遵循的规范。又如题名为小相如辑的《倚声宝筏》一卷,编撰目的与《玉遂楼词学标准》相类。是书辑录以张炎《词源》、陆辅之《词旨》的内容为主,主要是突出词体格律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以阐述自己词学观点或弘扬词学流派观点为

^①金启华:《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29页。

编撰目的。如郭麐《灵芬馆词话》的编撰即围绕推尊朱彝尊及其浙西词派词学理论展开。郭氏于清初词家,对浙西词派朱彝尊推崇备至。他以为“本朝词人,以竹垞为至,一废草堂之陋,首阐白石之风”,又首肯朱氏“词实至南宋而始极其能”^①之论。其后如沈泽棠的《忤庵词话》的编撰亦旨在推尊浙西词派。而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的编撰则以特尊周济、发展常州派词学观点为目的,是著称周济与二张、董氏“各致力于词,启古人不传之秘”,能“瓣香周、秦以上,窥唐人微旨”。并在周济“以无厚入有间”基础上提出“以有厚入无间”的观点,发展了常州词派的词论。其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徐珂辑《复堂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等均是围绕常州词派的理论进行探讨并予以编撰成文。

其四是“助填词”。即为教授作词之法或为后世学词者提供学词之法者,有学词教科书的性质。如贺裳《皱水轩词筌》序云:“余之于词数矣,顾《词旗》止掇芳蕤,未商工拙也。《词榘》止陈昭代,未及前朝也。因就尤所赏心,及当避忌者,漫列数端,谓之《词筌》。”“筌”既有方法、途径之意,可见是书之编撰当为示人以作词之法。民国时期就有余毅恒《词筌》以为学生习词教材^②。又如李渔《窥词管见》论作词之法,亦予细致解说。赵尊岳称其书是为“足为学词者之一助”^③,可知其编撰目的所在。其他如晚清时期江顺诒《词学集成》,据宗山序:“词之为道,自李唐沿及两宋,滥觞厥制,渐至纷纷歧出,有江河日下之慨。先生忧之,为之寻源竟委,审律考音,取诸说之异同得失,旁通曲证。折衷一是。所以存前人之正规,示后进之准则。”又据《词学集成》分门别类的编撰体例可知,是著可知确以逐次教授作词之法为编撰目的。其他如毛先舒《填词名解》、沈谦《填词杂说》、孙麟趾《词迳》的编撰目的均是如此。

其五是互为“标榜”。这些词话主要为友人词选鼓吹,起到“宣传造势”的作用,以提高词选名气为目的。如龚鼎孳《香严斋词》前有词话一卷,汪懋麟《锦瑟词》前有词话一卷,毛际可《浣雪词钞》前有吴陈琰评《浣雪词话》一卷,郑景会《柳烟词》前有词评一卷,曹贞吉《珂雪词》有曹禾评《珂雪词话》等。这些词话一般卷帙无多,多为对于词选内容或创作情况的述评,对了解词人及词作的整体风貌有一定的帮助,然所评者均为词选作者友朋,故词话内容多褒扬、鼓吹之语,或相似于今人书后附他人之评论,以为其著做广而告之的功用。吴熊和《〈词话丛编〉读后》即云:“清初词集,于卷首每有词话词评,盖为一时风尚。”^④

其六是“追名逐利”。以此为编撰动机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割裂抄纂他人作品为己书,以名世者。如沈雄《古今词话》、徐钊《词苑丛谈》等。沈雄《古今词话》据其凡例记载:“词话者旧有《古今词话》一书,撰述名氏久矣失传,又散见一二则于诸刻,兹仍旧名。”知其著述当在旧有《古今词话》一书基础上增益时人词学资料而成,王国维亦认为“岂雄窃此书而复益以近代事欤?”^⑤笔者又据相关资料考证,知其或为抄撮、割裂明人绿窗居主人所作《古今词话》一书而成,^⑥“仍旧名”也体现其编撰目的或在于以是书名世。徐钊《词苑丛谈》亦为杂采数家词话,割裂原文拼凑而成,其编撰目的不言而喻。二是将前人词话进行汇辑并与词选合刻以求利者。陈耀文编《花草粹编》、明刊《草堂诗余》系列均属此类。陈氏《花草粹编》前附宋人沈义父《乐府指迷》词话一卷。明刊本《草堂诗余》中亦多附有宋人词话资料于其中。其目的或正如张宏生所说:“晚明的出版文化,特别是评点之学,有一个非常

①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04页。

②据余毅恒《词筌》例言“著者于一九四三年出版《词筌》一书(重庆正中书局出版)。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于新疆学院中国文学系讲授《词选及习作》时,将《词筌》部分章节予以修订,印发给学生作为辅导教材。”见余毅恒著《词筌》(增订本),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版第1页。

③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17页。

④孙克强:《词话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⑤施议对:《人间词话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42页。

⑥关于此说,笔者已在《明人本〈古今词话〉》一文中详细进行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显著的特点,即经常假托文化名流为评点者,以扩大销路,取得良好的经济利益。”^①

其七是“为学问”而作。明清两代,一方面,不同时期的词话作品在编撰方法、编撰体例上均受到这一时期学术环境、文化风气的影响^②。另一方面,有些词话本身则纯粹是以学问为目的而进行编撰的。如宋翔凤《乐府余论》即把词作为专门的学问进行解读和阐释,其中引用《说文》等典籍对字词来进行考据,并发挥微言大义,阐发词作寓意的内容。其他如焦循《雕菰楼词话》等亦是如此,此类词话作者多为经学家,故其编撰词话亦将其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进行考据阐释。其他如冯金伯《词苑萃编》对徐鉉《词苑丛谈》“次序错综”等词学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并为之进行考辩、删订,亦是对其“引书必注、隶事有序”严谨治学观点的宣扬。

其八,宣扬文学观念。明清词话中有些作品以在词话中对某一文学观念或美学范畴进行宣扬,并以此为目的进行编撰。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一方面标举“境界”为最高美学范畴;另一方面,王氏将写景的言情真切、自然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③。当可知其编撰目的或在于对西方美学的宣扬及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批评。有些词话的撰述目的则在于对其词史通史建构的宣扬。如厉鹗《论词绝句十二首》、谭莹《论词绝句》等韵文式词话即通过讨论词的起源与唐宋金元词史中经典作家和词学著述来达到构建其词史通史的目的^④,故知其编撰目的旨在展示自己的词史观念。

其九,彰显郡邑文化。即以矜夸编者籍贯邑里的词家词事或宣扬舆地文化内涵为其词话编撰目的。如曹学佺《蜀中广记·词话》、杜应芳《补续全蜀艺文志·诗话四附诗余》两著内容涉及的人士均为五代至元仕宦或侨寓蜀中者,当知其目的在于对蜀地文化内涵的宣扬。又如谭莹《论词绝句又三十六首》专论岭南词人,显示出论词绝句作者对岭南一地名家的选择与认同,其编撰目的或为矜夸编者籍贯邑里的词家词事。

总的来看,明清词话的编撰动机不外乎以上九种。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词话编撰动机并不是单一的,有时候往往是兼有多重动机。如上文所述以“立宗开派”为编撰目的的词话,一定意义上也有彰显其舆地文化的意味。又如郭麐《灵芬馆词话》的编撰有宣扬浙西词派的目的,其卷一追述词之派别、论及历代词家也有宣扬其词史观念的目的,其对友朋往来题咏之作的记载又具有“备遗忘”的编撰目的。许昂霄撰、张载华辑《词综偶评》对于撰著许昂霄来说有教授门人词法的目的,对于编者张载华来说又有传承师学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对其编撰动机进行研究,有利于我们梳理明清词话的整体演进历程。同时,也可以看出,明清词话编撰目的的丰富性在一定意义上能促使其编撰的兴盛。

二、明清词话的编撰类型

明清时期词话数量众多,其编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笔者基于上述的编撰动机,对明清词话考察后发现,明清词话在编撰方式上既有对宋元时期词话编撰的继承,又进行了自我创新。概言之,明清词话的编撰方式主要有原创撰述、汇辑抄录、增删修订等三大类型。具体论述如下。

其一是原创撰述型。即作者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于文,或在从事词学创作及词学活动时将对词的体认述之于笔,用以阐述自己的词学主张。原创撰述型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指词话内容

^①张宏生:《杨慎词学与〈草堂诗余〉》,《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②参见谭新红:《词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18页。

^③张器友:《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

^④孙克强,杨传庆:《清代论词绝句的词史观念及价值》,《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

的原创,主要为作者自身对词的体认或对词话的精心架构。如刘体仁《七颂堂词绎》,从其命名我们即可以看出,“绎”据《说文》解释为“抽丝也”,《集韵》解释为“释”。词绎可理解为对“词”的“解释”和“演绎”,刘体仁即是通过词作、词之作法、词家等皆进行品评,来表达自己对“词”的创造性的解读和演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本附于《艺苑卮言》,据是书序文中又说:“又八年而前后所增益又二卷,黜其论词曲者附它录为别卷,聊以备诸集中。”可知是书经过了王氏深思熟虑之后为之调整、整补的,有一定的精心架构。其他如王士禛《花草蒙拾》为王氏品读《花间集》、《草堂诗余》的心得以及对词友评点等。又如贺裳《皱水轩词筌》、沈谦《填词杂说》等是为后学讲学词之法的,多是作者的心得和原创。二是指编撰体例的原创,即通过对体例的创新编排来彰显自己的词学主张,如沈雄、江尚质《古今词话》,江顺诒《词学集成》等在编排体例上对词话内容进行分门别类,以体例创新的方式来展现编撰者一定的词学主张。三是指词学观念的原创,即通过引用或自撰词人词事资料来阐释作者独有的词学观念的。如陈霆《渚山堂词话》虽有博采前人及时人逸事佚句的成分,但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这些佚词佚句的语言、风格并用以阐释自己的词作审美思想。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亦通过对前人词句的评判和解读来诠释其“意境说”。

其二为汇辑抄撮型。这种类型主要通过汇辑、抄撮等方式来对词话进行编排。“汇辑”即通过收集各种文献资料中论词之语荟萃成书。这其中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粹将历代文献中的话词、论词资料荟萃在一起而编排成书的。如王奕清《历代诗余·词话》,王熙元《历代词话叙录》称其“自唐迄明,凡见于历代载籍论词、话词之语,皆广为搜采荟萃之,以集词话之大成。”^①可知是书之编撰方式。又如《倚声初集》《花草粹编》等词集前所附词话即是编撰者通过汇选的方式编撰而成的。另一种为“辑”,即将前人笔记、诗话、词选等各种文献典籍中的论词、话词资料进行收辑、并按照一定的体例进行编撰的。“辑”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辑”自己的话词资料编撰成书。如杨慎《词品》,据张静《评点与词话——杨慎评点〈草堂诗余〉与撰著〈词品〉之关系》^②、朱志远《〈百琲明珠〉辨考》(作者未刊稿)等考证,是书乃为杨氏将自己评点《草堂诗余》、《百琲明珠》等词选中的评点之语进行收辑编撰而成的,故杨氏此书不仅有其自创的成分,亦有“辑”的意味。二是“辑”他人的话词之语编撰成书。如许昂霄、张载华辑《词综偶评》,许昂霄曾将《词综》依次评点,用以教授门人。其门人张载华将许氏的评点之语及其读词杂记中的评词之语辑出,均按《词综》的编排次序编撰而成。又如谭献撰《复堂词话》亦是谭献的门生徐珂将谭氏文集、日记及所纂《篋中词》及所评周止庵《词辨》等书中论词之语、评点之语收集起来,按一定的体例编撰而成的。此外,清人词选前所附多人评点一人的词话亦是词选作者通过汇辑的形式将他人所评自己的话语汇辑起来编撰而成的。如《香严斋词话》评龚鼎孳词,《咏物词评》评曹贞吉词,《菊庄词话》评徐鉉词等。“抄撮”即纯为抄写前人资料中论词话语,录而不述,目的在于保存词学资料。如单宇《菊坡丛话·诗余》即通过抄《唐溪诗话》《后山诗话》《离人泪诗话》《温叟诗话》中的论词之语进行编撰的,范缜《读书堂词话偶钞》等亦是此类。此外徐鉉《词苑丛谈》亦是抄撮群籍而成,故其体例混乱不注出处。

其三,增删修订型。“增”即是在原人旧有词话的基础上通过增加相关词学等资料编撰而成。如沈雄《古今词话》即是在绿窗居主人的《古今词话》基础上,增加清初词人词事编撰而成。又如冯金伯编《词苑萃编》即在徐鉉《词苑丛谈》之底本上加以增删改订而成,一定程度上扩充了原书内容。据冯金伯自序云:“予向读兹书,更惜其序次错综,屡欲重加排纂,匆匆未果。甲子入秋后,枯坐于小舟,萧然无事,思了此愿。”可知,冯氏有鉴于徐书所录未注明出处,在编排上因随时随地抄录集结而漫无次

^①王熙元:《历代词话叙录》,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第98页。

^②张静:《评点与词话——杨慎评点〈草堂诗余〉与撰著〈词品〉之关系》,《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2期。

序的情况,对徐书予以增删和重新排纂,“比原书删者十之一,增者已十之三四矣”^①。另有书商通过割裂已有成书从而形成一种新书的行为。“修订”则是将本人或他人的著述内容进行考据、审订并编撰成书者。如李调元《雨村词话》是在修订、校讎前人词学之误的基础上编撰而成。又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本为十卷,陈氏生前就五易其稿,为之修订,后又经其父陈铁峰为之审定,并删成八卷,最终由许氏门人等为之斟字刊行^②。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本为一百二十五则,王氏付与《国粹学报》时曾为之修订并整补一则,据手稿本与《国粹学报》本的对比也可以看出两者在文字上亦有所不同,亦可证王氏在刊行时对原稿进行了校订。其他如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亦是经过不断地增益、调整而终编撰成书的,张宗橐《词林纪事》亦经由张氏几经修订而最终撰就而成。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撰者精益求精的编撰心态。

明清时期词话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其编撰方法亦有多重性的一面。如有些词话从内容上看属于抄撮前人话词、评词之语编撰而成,但从体例上看又有其新创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明清词话存在形式的多种多样也与其编撰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有些词话是以专书形式存在的、有些则以专卷的形式或冠于词选之前,或附于诗词文集之末。在一方面,明清时期词话的编撰方式亦为后世编撰词话所借鉴。如张载华将许昂霄《词综》中评点之语进行汇辑的方式就被后世学者所借鉴。唐圭璋汇张惠言《词选》中评点之语辑为《张惠言词话》,胡念贻辑先著、程洪《词洁》中的评词之语而为《词洁辑评》等,均受明清时期这种编撰方式的影响。孙克强《历代词人词话》系列、邓子勉《宋金元词话全编》《明词话全编》等在编撰方式上亦多取法于明清词话的编撰。

三、明清词话的编撰特点

系统考察明清词话的编撰特点,既有助于准确评定其历史地位,又对于研究明清词话的编撰历史有不容忽视的意义。通过对明清时期词话编撰者动机及编撰方式类型的考述,我们可以发现明清词话编撰特点也与前代有所不同。故笔者拟从明清词话编撰者身份、编撰对象和内容、编撰过程、编撰体例等方面考察的基础上,对明清词话编撰的若干特点进行初步分析。

从编撰者身份来看,明清时期,词话编撰者有官方、私人并行的特点。由于编撰者身份各异,故其编撰目的以及其编撰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明清时期就有官方为主题参与编撰的词话,其目的主要彰显朝廷文治武功或宣扬政教。如康熙帝组织文人编撰《历代诗余》,即附有词话十卷;乾隆帝勒令编撰《四库全书》中即收有《渚山堂词话》《西河词话》《词苑丛谈》等。官方的编撰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词学的兴盛以及词话编撰的繁盛。明清时期私人编撰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词家身份参与词话编撰活动的。如俞彦、彭孙遹、郭麐均为当世以词著名者;一是以学者身份参与词话编撰的。如杨慎、谭献、王国维等。因编撰者身份的不同,词话在编撰过程、编撰体例、编撰观念上均展现了不同的特点。如词人身份的词话编撰者多为漫记、偶评,故其编撰体例也较为散漫,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学人身份的词话编撰者在编撰观念上视词学为学问,在词话的编撰过程中对词话编撰的精审性有一定的要求,对词话的编撰体例也有一定的思考。

从编撰的对象上看,明清词话有内容丰富多样的特点。这一时期,单独以词学的某一方面为编撰对象的词话已不多见,而更多的是复合型词话的出现。编撰对象的内容丰富、多样指的是明清词

^①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702页。

^②参见唐圭璋《白雨斋词话后记》,《词学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54页。

话编撰者将词人逸事、词艺、词的起源、词与音乐关系、词的音韵、词律、词的作法、诗词曲关系、词的风格流派等与词学相关的都列为其编撰对象。如张宗橐《词林纪事》专以词事为其编撰对象。叶申芑《本事词》、徐钊《南洲草堂词话》等皆属此类。贺裳《皱水轩词筌》、许昂霄《词综偶评》以品评历代词家词作为编撰对象,谢元淮《填词浅说》、方成培《香研居词尘》等以词之平仄宫调为编撰对象,李渔《窥词管见》、沈谦《填词杂说》等则以词法为编撰对象,毛先舒《填词名解》、汪汲《词名集解》以词调溯源为编撰对象等。这些词话虽以上述内容为主要编撰对象,但亦涉及到词学的各个方面。有些词话的编撰对象则囊括了词学的各个方面,如沈雄《古今词话》、徐钊《词苑丛谈》、江顺诒《词学集成》等荟萃各家之说而成,其编撰对象涉及词学的各个方面。

从编撰体例上看,明清词话有随意性和系统性兼有的特点。编撰体例的随意性指词话编撰者在编撰之初到最终成稿的过程中并未对词话编撰次序、体例等有过设计和建构,故词话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随笔而记,漫无次序的一种状态。如王士禛《花草蒙拾》有记云:“往读《花间》、《草堂》,偶有所触,辄以丹铅书之,积数十条。程村强刻此集卷首,仆不能禁,题曰《花草蒙拾》。”可见,王士禛《花草蒙拾》本为王氏在阅读《草堂》《花间》时的随笔漫记,邹祗谟将其列于《倚声初集》时,王氏也并未在编排体例上有所思考,只是“题曰《花草蒙拾》”而已,可见其编撰体例的随意性。其他如贺裳《皱水轩词筌》“漫列数端,谓之《词筌》”,陆鏊《问花楼词话》“偶阅花间、草堂诸刻,追忆旧闻,久遂成帙”,沈祥龙《论词随笔》“偶有所得,则笔而存之”等均可以看出,这些词话编撰者在其编撰之初,或刊行之时,均未有在编撰体例上进行思考,表明其编撰体例的随意性,散漫性。另一方面,有些词话的编撰者则对词话的编撰有过一定的思考和建构,他们在进行词话的编撰时对其编撰次序、类别等均有一定的思考和运用。如江顺诒《词学集成》首列“凡例”九则对其编撰体例有所说明,并在其编撰中将其编撰对象进行了分门别类,体现了其编撰体例的严密性。王又华《古今词论》从其命名上既可以看出其以“古今”为次序编撰体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撰写在编撰体例上也是经过缜密思维的,其编撰从温、韦到宋六家依序展示唐宋词的发展进程出发,对唐宋词的发展进行了史的建构。孙维成称其为一部史论结合的伟大词学著作^①,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编撰体例的严密性特点。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在编排方式上使用层层递进的手法,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其“境界”说。

从编撰过程来看,明清词话既有经作者精心建构的特点,又有随意撰就、拼凑的特点。由于编撰者身份、编撰观念、编撰动机不同,故编撰者在编撰过程中对词话的编撰态度也是不同的。有些词话的编撰是一个随意拼凑、随笔而记的简单过程,而有些词话的编撰则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推敲、精心构建的复杂过程。前者如王士禛《花草蒙拾》及清人词选之前所附词话等评点类词话,编撰过程大多是随笔漫记,久成卷帙,此外有些词话是抄撮旧闻及时人之语拼凑而成的,其编撰也是一种随笔而录,进行简单拼凑的过程。而有些词话的编撰过程则是精心建构的。如有些词话从其编撰的历时之久,就可以看出词话作者在编撰过程中对词话的体例编排、内容取舍上的思考和审定。从词话的编撰过程也可以看出,这些词话编撰者均几易其稿,在内容及编排次序上不断进行调整,最终编撰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词话精细化的特点。如王世贞《艺苑卮言》的编撰历时约十四年之久,在其编撰过程中不断的对其内容有所增益,最终,王世贞将其论词曲的部分单独辑出,附于书后,知其对论词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精细化的,其编排也是经过了一定的精心架构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据其甥包荣翰《跋》可知陈氏此书编撰过程历时十年之久,陈氏更是五易其稿,始得其十卷稿。究其原因,据陈氏自言:“于是编历数十寒暑,识与年进,稿凡五易,安知将来不更有进于此者乎?”^②可见陈

^①孙维城:《千年词史待平章——晚清三大词话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②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屈兴国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850页。

氏对词话的编撰精益求精的态度,是书在刊刻之时,又由其父陈铁峰进行审定,将其十卷本压缩成八卷,删去其中散漫之句,使得词话的更加紧凑、周密^①。其他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的编撰更是历时达三十年之久,故其词话的精审与卷帙的浩繁在明清自撰类词话当中都是无出其右的。

通过对明清词话编撰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词话的编撰在明清时期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虽然明清词话的编撰并未摆脱宋元时期以随笔漫记、简单拼凑的习惯,但是以学人为代表的词话编撰者在内容和体例上为词话编撰开启了一种新的模式,为词话编撰的精深化和系统化、理论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明清词话的编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清时期词话编撰的精深化与编撰者的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明清时期编排理念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余论

明清词话编撰的研究是明清词话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认为编撰史主要是“认真总结古代图书编撰的历史经验,对于弘扬传统文化、繁荣当代图书编撰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笔者对明清词话编撰动机及其类型特点进行研究,就是希望可以在此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词话论著(包括别集或总集中成卷之词话)的编撰进行全面的梳理,进而更加深入地探讨明清时期词话编撰的理论意义与学术意义。

明清词话的编撰体例等为后世治词者所借鉴,并对后人词学研究的分类也具有启示意义。如明清辑类词话的分类编排方式直接影响到后世乃至当代学者对词学研究领域的分类。《词苑丛谈》“体制”中引用的文献涉及到词的起源、词体特征,“音韵”涉及词律、词韵、词谱,“品藻”涉及评论等等。《词学集成》亦分有词源、词体、词中音韵、词之流派、词之要法等类别。近代及现代学者关于词学研究的分类即多是建立在清人汇辑词话编排分类的基础之上的。如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将词学分为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等八类;唐圭璋先生的《历代词学研究述略》又分为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等十个方面等。

明清词话的编撰方式对后世词话的编撰产生了影响。如唐圭璋《词话丛编》、朱崇才《词话丛编续编》、葛渭君《词话丛编补编》、屈兴国《词话丛编二编》等丛编式词话以及邓子勉《宋金元词话全编》《明词话全编》,孙克强《历代词人词话》系列等汇编式词话,均在编撰方式上取法于明清词话。这些做法虽在保存前人论词资料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其强以某某词话冠名的方法有混淆明清词话概念的嫌疑,让人误以为明清时期就有此种词话存世^③。我们在进行明清词话编撰研究时必须对这种情况予以辨正、说明。

明清词话编撰的研究是明清词话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能够加快学界对明清两代词学文献的整理进程。词话文献与词学研究有一定的互动性,词话文献的整理能够促进词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反过来,词学研究对词话文献整理亦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从明清词话编撰研究入手,不仅可以为明清词话整理与研究提供一个较好的理论框架,用于指导词话整理的细化、深入,还可借以解决当

^①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9页。

^②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③曹辛华在其《论〈全民国词话〉的考索、编纂及其意义》(《泰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曾言“对那些已被后人或时人整理、且已冠以‘词话’或视之为‘词话’者,不宜再责其非而忽视,当在考述时予以辩证地承认。”对此问题已有探讨,并在其《全民国词话》中将汇辑前人论词资料以“词话资料汇编”的形式出现,我们较为赞同这种编撰方式。

前词话整理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总之,明清词话编撰研究不仅是明清词话史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明清词学文献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只有对明清词话的编撰内容、形式、体例以及其编撰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在此基础上对词话的刊刻、传播、影响等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对明清词话所蕴含的词学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的发掘,进而才能真正把握明清词学的整体走向及嬗变过程。同时,明清词话的编撰的研究还将为近代词话、民国词话的研究提供借鉴,为民国词学文献学的研究提供参照,促使词学的整体研究达到真正的繁荣境界。

(责任编辑:陆 林)

Compilation of Remarks on *Ci* Poet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Motives,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LIU Yue-lei

Abstract: In spite of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in the study of *ci* poet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o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history of remarks on *ci* poetry in this period. Also,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compilation of these remarks. Motives for compiling remarks on *ci* poetry fall into 9 categories. Some compilers were motivated by collecting materials for conversations; some by providing documen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some by promoting a certain theory; some by teaching later generations how to compose *ci* poems; some by attracting public attention to their friends' works; some by fame and wealth; some by doing academic researches on *ci* poetry; some by disseminating a certain literary idea; and some by publicizing the local culture of a certain prefecture or city. Different compiling motives give rise to different compiling types. Some compilers record what they have seen and heard or give their own understandings of *ci* poetry; some collect different kinds of literature on *ci* poetry; and some make adjustments to existing works on remarks on *ci* poetry.

Key words: remarks on *ci* poetr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mpilation motives; compilation types; compilation characteristics